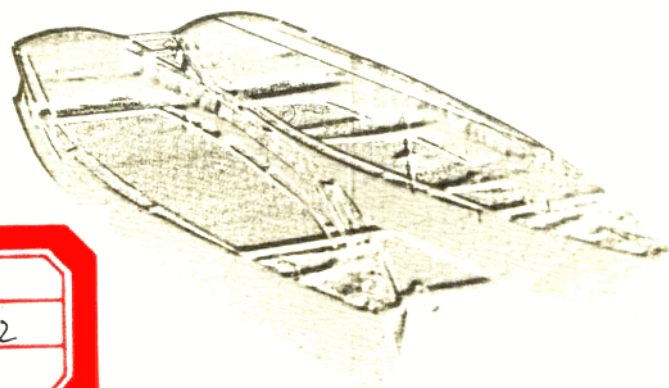


静谧的夜里，她扇动轻柔的
羽翼，飞进人们的窗扉
用她纤细温馨的爱情
唤醒沉睡的善心良知
她能为不幸者抚平创伤
自己却常常被折断翅膀
这就是诗歌，许多时候
她是一个不能自卫的弱女子

诗与诗人

厉风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诗与诗人

厉 风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1998年·沈阳

篇前的索思

诗中学步好几十年了。

说来惭愧，最初写诗时，我却不知诗为何物，不了解诗的功能，诗的使命，价值何在，魅力何在。那时我读诗不多，有关的理论，所知更少。

我的第一首诗，叫做《天上人间》。

1946年，在天津，我居住在一座六层大厦（当时该市最高建筑）旁边一间小房子里。每当夜晚，大厦的六层楼上，灯火辉煌，鼓乐之声不绝于耳，而在它的附近，流离失所的人却露宿街头。当时我寄人篱下，对此社会畸形，深有感触，不平则鸣，于是便写了那首《天上人间》。

在一不懂诗，二没有理论指导下写的诗，幼稚，肤浅，自不待言。但因为是有感而发，

感情是真实的，是符合诗的创作规律的，它的产生，就像婴儿饿了便哭一样的自然。诗给了《河北日报》，很快便发表了。不曾想，竟决定了此后我一生的命运，同诗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1950年，工作之后，天从人愿，我竟然真的干起了诗歌这一行当。先后在文学杂志、出版社担任诗歌编辑。工作需要，必须用革命文艺理论武装思想。大家知道，当时的文艺理论功利主义色彩是很浓的，同古代传统的经典论述多相悖逆。但是潮流不可抗拒，必须相信新的指导。我不只自己违背创作规律写那种虚情的诗，也教青年诗作者写那种诗：只注重宣传作用，不顾审美效果；只关心政策口径，不敢写个人（哪怕是健康的）感情……结果是，创作走入了死胡同，背离了我国优秀的诗歌传统。

在我，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过程。不懂诗时，写诗不自觉地遵循了创作规律；得到“理论”指导后，写诗却违背了创作规律。我必须声明，我非是有意贬低理论的作用，正确的理论，确实能帮助创作的良性进行，而错误的理论，只会把诗引向歧路。

正是基于此，当出版社慷慨地接受了我的这本小书时，我却变得忐忑不安了，原来的信心消失了，代之出现的是惶惑和犹疑：我的这些杂乱

无章的(多是应报刊之邀写的)东西，能给读者什么帮助呢？

此外，书中有几篇文章，我冒失地提出的抒情诗中的典型问题，抒情主人公的鲜明形象构成诗的魅力问题等，也使我不无担忧。诚然，这些认识和感悟，是既得之于先辈们的宝贵遗产，也是得之于个人的学诗实践，惟望书中这些零碎的一得之见，不是谬论，对初登诗路的年轻朋友不会产生误导，幸甚！

1998, 3, 11日

目 录

篇前的思索(1)

诗论诗评

大自然的启示

——我与诗歌(3)

诗人与写诗的人

——读书小记(15)

谈抒情作品的典型问题

——读李后主词(20)

关于诗集《梦土》的两封信(26)

几点体会

——未发出的信(32)

诗歌笔记(四则)(41)

一个诗人,是怎样开始工作的呢?(48)

爱情诗中的时代精神(58)

诗,语言的艺术

- 写给爱诗的青年朋友(72)
- 诗人的自信
- 自费出书随想(80)
- 诗难懂(83)
- 绞脑汁的随笔(86)
- 诗和诗评小议(91)
- 我的感想(94)
- 一眼见底辩(98)
- 《雪花和樱花》及有关的几句题外话(101)
- 读诗小记(104)
- 新诗改罢自长吟(106)
- 诗人(109)
- 死于君王，活在诗中(111)
- 无花的玫瑰(114)
- 这，也应是个“秘密”
- 读刘湛秋《诗的秘密》随想(117)
- 诗的悲哀(120)
- 文学，让我懂得了……(122)
- 一九八三年辽宁诗歌创作一瞥(125)
- 她在远方歌唱
- 读林雷诗随记(136)
- 鸽子，毕竟是美丽的
- 读邓荫柯《怀念那只鸽子》(145)

豪迈的歌

——评两个工人的诗(149)

景象·构思

——读《在欢乐的中苏国境线上》(162)

诗贵情真(169)

读高深诗集《苦歌》(179)

凝炼，清醇，小中见大

——读刘畅园诗(184)

读《我读中国》(191)

以诗谈诗

当我读着这样的诗(199)

我问缪斯(201)

我——诗中的“这一个”(202)

诗的信念和困惑(204)

形式(206)

苑中的花(207)

皱着眉头写诗(208)

致某诗人(210)

不要夸大其词(211)

附录

编辑札记(片断)(215)

诗
论
诗
评

大自然的启示

——我与诗歌

十年前，应解明兄之邀，我写过一篇题为《文学，让我懂得了……》（沈阳日报，1984.3.20）的东西。文学确实让我懂得了许多，主要是做人的道理。在文中，我还记述了一段大自然的启示，这个启示使我重新认识了我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本身，它的生存和繁荣需要什么样的气候和环境……

那段文字是这样的：

十年浩劫中，我像一粒草籽被扬到一个偏僻的山区，我没在那里扎下根来，却在那里受到了启蒙和教育。在一片幸存的原始森林中，一到春天，许多

的山花竞相开放，真是绚丽多姿，姹紫嫣红；山林里也有许许多多的鸟儿，唱起歌来，也是各有各的音色。它们，山花和鸟儿，都是以天然的真诚，以自己的音容笑貌，感谢着太阳和春天。

在这大自然的怀抱里，我的艺术生命觉醒了……我悟到，艺术，像山花和鸟儿一样，也多么需要和煦的阳光与温暖的春风啊！

这是有感于当时万马齐喑的慨叹。

但是“文革”前的十七年呢？十七年当然不同于十年浩劫，十七年有“双百方针”，但却未能始终如一地真正地贯彻执行过。艺术也就未能始终像山花、鸟儿那么灿然地开放，纵情地歌唱。

十七年里，我陆续写过一些诗，也被称为诗人。后来一想起便觉惭愧。严格说有的算不上是诗，没有真情实感，凭着一点儿技巧，兜售人人皆知的概念。所以，我常想，人们把写诗的人一概称作诗人，是不对的。写诗的人不一定是诗人，这在图书也是商品的今天，尤其不全对。不是有的人只要出钱，不管那诗的成分含量多少，也照样可以变成铅字印成书，也就可以叫做诗人

的吗！

这是诗的悲哀，艺术的悲哀，缪斯有知，当会掩面而泣。

关于诗，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家钟嵘在其名著《诗品》中开宗明义地写道：“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摇荡性情，形诸舞咏……”《文心雕龙》的作者刘勰也有相似的论述：“春秋代序，阴阳惨舒，物色之动心亦摇焉。”（物色篇）又说，“人禀七情，应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”（明诗篇）批评家谈的都是诗歌的产生规律，是客观世界作用于诗人的心灵，摇荡了他的性情，从而吟发为诗的。至此，何为诗人，何为写诗的人，不同之处也就明白了：感受客观世界的“物动”，需要特殊的禀赋，真正的诗人有此天赋，而写诗的人没有；此外，在对创作规律的认识和对诗的功能的理解方面，二者也存在着几乎是相反的差异。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，就是对一个诗人来说，最珍贵的不可或缺良知和真诚。

我真正舒畅地合乎规律地写诗，是打倒“四人帮”，思想的禁锢解除之后。

1978年，我刚“流放”归来，便有机会去了旅顺，在那儿参观时得助于于植元教授的解说，回来便写了第一个组诗《旅顺口纪行》。之

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又连续写出了几个组诗：

《鸭绿江上的速写》《陨星及其他》《北戴河抒情诗》《棒槌岛速写》等，此外还写了数十篇零散短诗。《陨星及其他》，1980年获“鸭绿江作品奖”。

这些诗的产生更证明了大自然的启示：艺术的诗歌，像山里的花，林中的鸟，多么需要适度的气候。这些诗，除《棒槌岛速写》外（没赶上入集）都收入了1981年出版的诗集《露珠和星星》。诗集中还选入了一组《爱情的独白》（十四首），是写于“文革”前的，共有五十首，全为十四行体，这些诗，即使在十七年间，发表也是难以想象的。

不少朋友应该记得1957年《处女地》上连续几期关于爱情诗的大讨论，好几位诗人、诗评家都写了文章，对爱情诗中的问题，诸如宣扬低级趣味，宣扬阴暗、伤感、颓废感情，宣扬平庸、陈旧调调，描写虚伪感情，描写小资产阶级无病呻吟、空虚等个人主义感情，进行了批判，同时提出了爱情诗要表现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。我也写了文章，题目就是《爱情诗中的时代精神》，主要的论点是，不同意说爱情诗的时代精神应是爱情与劳动的结合，不同意说爱情诗只应表现欢愉的情绪，不同意说不“联系”什么的爱

情诗都是“为所欲为地抒发个人之情”，而且认为“把主题划分为‘个人的’和‘社会的’常常是人为的划分。”关于讨论我提出了应该把爱情诗作为抒情诗这一属性来探讨，看问题就不会流于偏狭了。

要知道那是 1957 年 7 月，正是反右斗争中。刊物主编田家同志在为这次讨论写的总结文章《反对爱情诗讨论中的右倾思想》中，据说基本上肯定了我的观点，大概因此，我在单位的处境才没有雪上加霜。

我正是按照我自己对爱情诗的认识写了那五十首《爱情的独白》的。它们确实是我人生旅途的一段插曲，一个难得的带有浪漫色彩的特殊的片断。在诗中，我不仅仅是写了爱情，也有意透露了当时“资产阶级”知识分子的爱情生活的不自由。

……按照习俗，这天应该备些糖果，
我还买了你喜欢的红酒绿茶，
自然，我也忘不了为客人
准备了几包高级香烟。
我想总会有几位要来的吧？
可是，谁知道呢，也许到头来，
只有你和我，相对黯然

.....

(《擦干净尘封了一冬的窗子》)

结婚那天，只有少数几位朋友闻讯赶来。事后得知，原来大家都接到过不准前来的通知……

在那年代，恋爱婚姻，组织上出来代替家长是常有的事。所以，我在《露珠》后记中，关于《独白》那组诗，特别写了句：“……请不要把它们视作个人生活的记录吧。”“文革”中抄家成风，恐惧时几次想把它烧掉。没曾想历史的发展，意外地使它也获得了生命。这些诗大部分已经发表。

1979年秋天，我在北京参观了党史展览馆，很快写了《陨星及其他》那组诗。党史馆里，许多志士、烈士、英雄，他们的事迹都很辉煌，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；他们的名字就像天空闪光的星星。我一边瞻仰着，忽然，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，我想到许多无缘或无资格进入这展厅的千千万万无名战士，他们为民族的解放、共和国的诞生同样尽了自己的责任，不妨说，没有千千万万群众的参加，都是不可能的。这些付出过青春和生命的无名战士同样伟大，他们的名字同样辉煌，同样应是天空闪烁的星。腹稿在展厅内就诞生了，这就是那首《我爱繁星》：

“我爱繁星，
因此我爱这许多
繁星一样发光的姓名。
我知道，在无边的苍穹，
还有更多更多的星星，
夜空才会那般深邃透明；
我知道，在这许多姓名之后，
还有很多很多闪光的英名，
就像宇宙深处的星星。

.....

差不多基于同样的意念，我写了另一首《刀和矛》。

我不知道，负责人陈列类如大刀和长矛这些物品时，是怎么想的。

常说，人民是历史的主人，群众创造历史。宣传中自然应该突出领袖的作用，但是，我觉得也应该充分展示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，使人们记住那默默牺牲的无名英雄。这思想属于概念，但借助具体的刀和矛，诗便有了形象，便有了色彩，读了留下鲜明的印象。

“一片大刀，